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院校发展 ——基于中心边缘理论的视角

张 征^{1 2}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2.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武汉 430074)

摘 要: 中心边缘理论在阐释发展动力结构方面有着较强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研究。中心边缘理论为分析民族院校发展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一带一路”倡议是调整中心边缘格局的重大战略抉择,为处于边缘的民族院校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由于民族院校的区位优势、多元文化优势和比较优势,因而具有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民族院校面临着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的巨大挑战。为实现从社会边缘、大学系统边缘和对外交往边缘到中心的三重发展目标,民族院校应采取聚焦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办学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民族院校; 中心边缘理论;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8; G649.21; G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12(2017)03-0052-07

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由于民族院校的数量不多,再加上外界对民族院校的了解也不够,以至于民族院校研究往往不为主流高等教育研究者所关注,而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办学类型,民族院校的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推进,新形势下如何办好民族院校,这既是当前民族院校管理者思考的重要现实议题,也是一个值得学界认真探讨的理论话题。

收稿日期: 2017-03-28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民族院校专业结构调整研究: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2015202); 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教育政策与法规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课题“新时期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研究”(2016PRY02)

作者简介: 张征(1978—),男,湖北京山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民族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 张征.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院校发展——基于中心边缘理论的视角[J]. 重庆高教研究, 2017, 5(3): 52-58.

Citation format: ZHANG Zhe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zu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er-periphery theory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7, 5(3): 52-58.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院校的发展机遇

(一) 中心边缘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

中心边缘理论是在“中心—边缘”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运用该分析框架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进入20世纪后,美国区域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将之上升为解释区际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后来,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该理论用于分析经济世界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发现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在经济世界的分工体系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2]。中心和边缘是构成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它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功能,由于能很好地阐释发展的动力结构,因此被广泛地用来解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问题。

从中心边缘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调整现有中心边缘格局的宏伟旨向。“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是我国参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创举,有助于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边缘的国际格局。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凸显,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我国中西部地区从改革开放的腹地变为前沿,从而达到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目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 中心边缘理论视角下的民族院校

中心边缘理论也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青睐,被用于解释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阿特巴赫提出的“中心边缘说”在教育学界较有影响。他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大学是中心,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则处于边缘地位;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精英大学构成了它的高等教育中心,而其他大学则依其实力分布于中心到边缘的连续带上。高等教育的中心与边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民族院校是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而建立的普通高等院校,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空间布局的维度而言,民族院校大多位于西部。建国初期,国家按照民族工作的需要先后设置了西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等,除中央民族学院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意义而位于北京外,其他民族学院基本上布点在地理边缘。“文革”期间,民族院校被边缘化,先后被停办甚至撤销。改革开放之后,民族院校得以复建,并且又增设了湖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等。除大连民族学院外,新设置的民族院校全都位于相对边缘的民族地区。可以说,设置大连民族学院是国家为打破民族院校边缘布局的一个尝试,它是唯一设置在沿海开放地区、以工科和应用学科为主要特色的民族院校。

从办学实力的角度而言,民族院校基本上处于高等教育系统的边缘。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仅有中央民族大学进入了“985工程”大学行列,从而处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心。其他民族院校则由于办学实力不强,在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相对靠后,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属于边缘大学。从学科结构的维度来看,民族院校一直被单独划归为民族类高校,尽管这种分类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族院校是以民族类学科为主的、有别于处于经济社会建设中心的经管类和理工类高校。当然,边缘大学并不意味着其发挥的作用不重要,民族院校在民族地区往往具有中心地位,譬如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之于所在省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民族院校从边缘到中心何以可能

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边缘有可能走向中心。“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

院校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民族院校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上有着自身的区位优势。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不仅是地理边缘,同时也与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有着较大的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汇聚到了西部地区,是改变西部边缘结构的重大历史契机。民族院校基本上分布于西部民族地区,即便是少数几所不在西部的民族院校也与民族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民族院校的区位优势将逐渐凸显,这是改变其边缘地位的有利条件。

民族院校的多元文化优势,有助于其充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使者。“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合作的纽带,更是文化交流的纽带,特别是“一带一路”所经区域多为民族宗教矛盾多发地区,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及其引发的“蝴蝶效应”,倘若处理不好这些矛盾,便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要文化先行,通过文化交流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构建友好信任的双边关系。民族院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与创新,具有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优势,特别是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中能够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作用,势必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中心。

另外,民族院校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上还具有比较优势。边缘的大学能更好地培养国家特殊需要的人才,能对发展需要做出迅捷的反应,并愿意更多地参与解决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3]。民族院校在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这些人才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生力量;民族院校位于西部民族地区,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方面还具有其他院校所不具备的地理优势;民族院校与沿线国家的大学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关系,熟悉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在对外教育交流合作中更容易达成共识。

二、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院校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但是其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之路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 人才培养能力不足

人才培养是体现办学质量的重要方面,决定着院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毫无疑问,人才培养能力强的院校处于高等教育的中心,人才培养能力弱的院校处于高等教育的边缘。民族院校属于我国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体系中的一极,与普通高等院校相区隔,这种以民族因素划分的“二元结构”阻碍了两类院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4]。因此,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升办学实力。

民族院校的人才供给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民族院校学科专业结构不够合理。受民族院校创办之初的指导思想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族院校主要通过设置与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相关的学科专业来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形成了民族院校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调整,当前民族院校已不再是围绕民族类学科专业办学的单科性高校,学科专业日益多样。但遗憾的是,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度相关的学科专业体系的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尽管现今民族院校的工学学科结构比重已经超越文科,成为民族院校的第二大学科门类,但其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供给能力仍满足不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5]。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民族院校的办学规模大幅扩张,然而,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伴生的多元高等教育格局却并没有出现于民族院校。这是由于民族院校缺少行业背景,在举办工、农、医等学科专业的时候,往往是单独布点,难以形成合理的学科专业链。

其次,民族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一是表现为民族院校的办学资源投入不足。仅从生师比考察,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民族院校的生师比普遍高于 20^①,未达到国家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的标

① 数据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物“2015 年民族院校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

准。民族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西部民族地区,他们进校之后通常面临着较长的学习调适期,因此,降低生师比有助于对少数民族学生施以个性化培养。二是民族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更新。“二元格局”下的民族院校较少与其他高校交流,导致民族院校内部办学同质化问题严重。定位于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亟须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构建适宜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案例库,将最新的教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另外,由于民族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缺乏相关行业依托,且与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也不多,缺乏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以致民族院校难以有效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 国际化程度不高

国际化反映大学与学术中心的互动情况,越是中心的大学,其国际化程度越高,边缘的大学则相反。民族院校国际化办学起步很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与国外大学建立校际联系,逐渐从一般性的接待转变为以交流合作为主。迄今为止,各民族院校都与国外大学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好交往关系,如中央民族大学与美、英、法、德、日等数十个国家的60多所大学建立了教师互访、科研合作和学生交换培养等合作关系;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院校均与10所以上的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6]。国际化既是一所院校办学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改善边缘与中心关系的重要途径。

当前,民族院校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走出去”与国外大学合作。目前仅有7所民族院校与境外大学开展了相关教育合作项目,不仅合作项目少,而且从合作院校及合作项目的层次来看,缺乏与高水平大学的合作,缺乏以理工应用型学科专业为依托的教育项目,也没有实现引进国外合作院校的课程教材体系、教师师资的办学目的^[7]。此外,有的民族院校采取校际交流的方式,在学分互认的基础上,构建了“3+1”“4+2”等人才培养模式,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一是学生的受益面较小,二是对改进院校教学质量的助益也不大。

从“引进来”方面来看,民族院校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民族院校留学生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高层次学历研修的比较少。虽然有7所民族院校开展来华留学教育服务,共对外开放了447个本科专业、256个硕士专业和57个博士专业,但真正吸收国外留学生的专业很少,且大多集中在民族类专业,如民族学、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民俗学等领域^[8]。从留学生的就读院校来看,中央民族大学的留学生规模最大,占绝对优势;其他民族院校学历生人数约占留学生总人数的1%。民族院校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国别数量在逐渐增多,但生源国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如西北民族大学来华留学生中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占其留学生总数的60%^①。所以,民族院校要注重对外宣传,改变目前留学生教育单纯以语言教学为主的局面,争取吸引更多以专业学习为目的的留学生。

“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民族院校需要及时更新国际化办学理念,采取多种方式展开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从而有效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改变对外交流的边缘状态。

三、民族院校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策略

中心边缘理论为思考民族院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既有从高等教育边缘国家演变为高等教育中心国家的典范,如19世纪的德国高等教育和20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从高等教育边缘区域发展为高等教育中心区域的成功案例,如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中国香港高等教育和美国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尽管这些从高等教育边缘到高等教育中心的发展之路各不相同,然而,从边缘到中心的变革并非易事,都与他们因应外部环境变化、增强自身办学实力分不开。

① 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各民族院校上报民委教科司的“民族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调研报告”。

(一) 民族院校的三重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民族院校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只有抓住这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才能实现民族院校的成功转型,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民族院校的偏见和误读。当前,民族院校从边缘走向中心,面临着三重发展目标:一是要实现从社会边缘到社会中心的转变。虽然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不能不说,民族院校还没有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中心,没有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当然,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客观上讲,民族院校大多处于民族地区,办学投入不足,师资条件和科研水平都落后于发达地区;从主观上讲,是由于民族院校因循守旧,办学理念不够开放的缘故。二是要实现从大学系统的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受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民族院校分为由国家民委管理的民族院校和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民族院校两类,不同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他们获取办学资源的途径有着显著区别。特别是在重点大学建设的政策背景下,除中央民族大学外,其他民族院校很难获得国家专项建设资金。民族院校要以办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目标,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办学实力,实现走向大学系统中心的目标。三是要在国际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民族院校在对外交往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只不过受既有办学思想的局限,民族院校较少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多元文化的魅力。把民族院校建设成为“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这是国家对民族院校办学定位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民族院校从对外交往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一种办学类型的民族院校,需要处理好“一流”与“特色”的关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院校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主要体现为生源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学科专业以民族类见长、科学研究以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重点。然而,“特色”不能作为掩盖其不足的理由。民族院校的首要属性还是大学,这与其他院校没有什么分别。因此,谋划民族院校的发展问题需要有大视野,要从民族院校在我国院校分类体系中的地位、从高等教育宏观政策之于民族院校的机遇等方面通盘考虑。民族院校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目标,需要以办学实力作支撑,只有成为“一流”才表明走向了中心。成为“一流”者往往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有着其他院校难以取代的特殊优势。

(二) 聚焦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这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而人才培养又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任务,所以,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只有切实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更好地服务西部省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民族院校要以《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指南,大力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业调整一直以来都是民族院校发展过程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严重制约着民族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也是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民族院校应该围绕西部地区“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和“一带一路”沿线六大经济走廊的人才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举办一批满足市场需求的特色专业,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借助于学科专业调整,民族院校还能够实现向应用型大学的转型发展。

民族院校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积极探索协同育人机制。民族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面临着缺乏行业依托的先天不足,要解决人才培养的资源局限性问题,民族院校就必须建立协同育人平台,聚集政府、行业、院校等多方教育资源,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地调动了民族院校所在区域的发展积极性,为政府、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民族院校要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主动探索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民族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9]。所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还需要他们懂得当地文化风俗习惯,而民族院校恰恰具有民族学和沿线国家非通用语言的教研优势,这为民族院校

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广西民族大学依托东南亚语种优势,建立了非通用语“3+1”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大批受市场欢迎的复合型人才,为民族院校的语言、文化等长线冷门专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总之,民族院校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大格局中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和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独特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 国际化办学的策略

要办高水平的民族大学,就必须开放办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族院校是关起门来按政府计划办学、按领导机关的意志办学,这是形成民族院校“二元格局”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院校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调整办学定位,参与到国际化办学的活动中来。但从民族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频率与层次来看,其国际化程度与办一流民族大学的目标还有着很大的差距。民族院校要树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办大学的意识,敏锐地看到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发展趋势对民族院校的影响,打开渠道,增加国际交流,办开放的大学,在对外开放中办大学^[10]。国际化办学,既能推进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也有助于提升民族院校教育质量、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做强民族院校的重要途径。

民族院校要建立起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目标的国际教育体系。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民族院校要加大开放力度,招收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使之从以语言教学为主转变为以专业教学为主。民族院校还要有效拓展双边多边教育合作,探索更多富有成效的合作方式,使合作双方师生受益。

民族院校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由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步减少,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会有所富余。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还难以满足其国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这为民族院校开拓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另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民族院校可以依托相关经济合作项目,在沿线国家建立教育基地,提升民族院校的品牌知名度。

民族院校应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引进高层次学术人员,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民族院校还应积极参与构建区域性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实现不同国家和院校之间的学历学位互认、学分积累与转换、职业资格认证和专业评估等,使之与沿线国家教育标准衔接,提升国际教育交流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
- [2]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7-9.
- [3] P G 阿特巴赫.作为中心与边缘的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 2001(7):21-27.
- [4] 马戎.应调整高校体系中的民族区隔[N].南方周末 2010-05-20(F31).
- [5] 张征.民族院校本科专业调整的特点与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 2014(6):47-54.
- [6] 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57-67.
- [7]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名单[EB/OL]. [2017-03-11].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sort/1006>.
- [8] 来华留学[EB/OL]. [2017-03-10]. <http://www.csc.edu.cn/Laihua/>.
- [9] 瞿振元.“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N].光明日报 2015-08-13(11).
- [10]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教育部民族教育司.蓬勃发展的中国民族院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52.

(责任编辑 蔡宗模)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zu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er-Periphery Theory

ZHANG Zheng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center-periphery theory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in interpreting the developing dynamic structure, so it's employed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widely. It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of Minzu universit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to adjust the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which brings more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marginalized Minzu universities, and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Minzu universities to the center, because of their locational, multi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Minzu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of the insufficient personnel training ability and the low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hree development goals from the periphery of the society,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the center, the Minzu universities should uphol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ing o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inzu university; the center-periphery theory; development strategic